

努力回答好当前诗坛面临的问题

□顾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诗歌创作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优秀诗篇,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民族,人民群众对诗的情感特别深厚,对诗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因此,我们讨论新时代诗歌创作问题,就不光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一定要直面当前诗坛,如实反映当前诗坛的实际情况,努力回答好广大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一、诗作要不要合时?就是说,诗歌同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关系,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关系?这本来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的问题,所谓“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进行诗歌创作,一定要心怀九州、心系百姓,立足盛世、立意高远,情思深邃、情感丰厚。诗的题材可以有大小之别,诗的境界却不能高下不论。如果只在琐碎小事里兜来兜去,只陷在“小我”深渊里不能自拔,写那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群众更无法弄懂的“诗”,这无异于钻进牛角尖,走入死胡同。“越是读不懂的诗越是思想深刻的好诗”的说法是一种误导,我们的诗歌,从理论到实践,绝对不能误入歧途。我们一定要热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积极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举国上下齐心拼搏的伟大时代潮流中去,让新时代诗歌呈现崭新的风采,打上深深的新时代烙印,成为伟大新时代最生动的见证。新时代诗歌一定要彰显大国风范、盛世气象、百姓情怀、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号角、奋进的鼓点、筑梦的记录、人民的心声。

二、诗性要不要坚守?我这里说的诗性,是指诗的人民性。这是诗之根、诗之本、诗之魂。中国诗歌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国传过来的,而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创造。因此,诗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永远是诗歌繁荣昌盛的沃土。诗离开了人民,诗之花就会凋谢,诗之树就会枯萎。现在,有人说,如今广大群众已经远离诗歌了,这话完全说错了。我退出工作岗位以后,喜欢到老同学、老教师、老同事、老朋友、老乡亲、老邻居那里串门、聊聊天。一见到人家的小孩子,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就会特别开心。小孩子叫我一声“爷爷”,他(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马上就要他(她)背几首诗给我听听。每逢此时,我既惊喜不已,又感慨万千。这些孩子有的还没有入学,十几首甚至几十首诗已进入脑海里了。中国人民同诗联系得这么紧密,爱诗爱得如此深沉,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得一见的。但令我诧异的是,孩子们诵读的为什么全是古典诗词,没有一首自由体新诗呢?这是一种千真万确的社会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诗语要不要锤炼?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创作,形成

了一个优良传统,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这就是特别重视诗语的锤炼,特别讲究诗语的精练。“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诗千改始心安”“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吟安一个字,用破一生心”等等名言,既是古人作诗的生动写照,又是留给后人的经验之谈。我常常为古典诗词的高度凝练拍案叫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仅16个字,情景交融,把背井离乡的士卒在归途中抚今追昔、因痛定思痛而更加悲伤的真实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古传诵而不衰。“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一个“绿”字何等奇妙,正是诗人多字比较、反复推敲,才落下这神来之笔,铸就这千秋华篇。胡适倡导自由体新诗时说:“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而许多人口只记住了其前半句。我们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从口语到诗语,必须走过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并不是随便一开口就能吐出诗句来的。创作出一首好诗,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寻常小事。我们在诗歌创作上,必须把功夫下到家。现在一些诗作者在炼字炼句上下下的功夫很不够。进入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让诗的语言焕然一新,充分显示出诗语的时代特征、时代风采、时代气息、时代精神来。这样,人民群众才看得上、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诗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无穷的活力。

四、诗韵要不要留住?诗为韵文,这是中国诗从诞生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形成的规矩,也是诗区别于而后兴起的其他各种文体的一个独特标志。从上古民谣开始,再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诗体变了又变,诗韵坚持不变,动笔作诗,就得押韵。中国人对诗歌如此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诗有韵味,读起来很顺口,因而觉得很顺气,很顺意,很顺心。这种审美习惯是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沿习下来的。我们作诗,应该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应当满足人民群众诗歌审美的需求。有人只强调诗的韵律、韵味,这还不够;因为诗的韵律、韵味替代不了诗的韵味,也发挥不了诗的韵脚在诗中的独特作用。当然,当代人作诗押韵应当是押普通话韵,平水韵之类的韵书已经过时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这代人作诗是给当代人看的,是留给后人看的,古人是看不到的。我还认为,诗歌押韵,只会给诗作增光添彩,决不会成为诗歌创作的绊脚石。我们可以把押韵放得宽一点,让广大读者读起来觉得琅琅上口也就可以了。

五、诗体要不要创新?中国诗歌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了。这三千年间,诗体几度更新,诗歌几度辉煌。一百年前,胡适等人借鉴外国诗歌,倡导自由体白话诗,形成了以翻译诗体为本体的中国自由体新诗。无论是中国诗或外国诗,都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密不可分两个方面,而翻译者只能翻译其思想内容,其艺术形式是难以翻译的。中国古诗诗词,不仅艺术形式不好翻译,许多篇章连思想内涵也不好翻译。例如,

“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读这5个字,总觉得诗情洋溢、诗意盎然,如果翻译成外文恐怕诗味全无了。因此,当初用翻译诗作为自由体新诗的样本,现在看来,恐怕还是有值得反思之处的。对自由体新诗的松散无型状态,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严肃批评,几位国学大师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则表示了不满情绪。自由体新诗不可能千年不变,永远如此。我认为,处在伟大的新时代,新诗体的构建到这时候了。只要我们认真汲取古诗诗词、自由体新诗、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的长处,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诗体是大有希望的。我坚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新时代,只要大家深入探索、大胆创造,自由体新诗长期以来不成型的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六、诗风要不要端正?中国人民历来视诗坛为圣境,是容不得污泥浊水玷污的。但是,诗坛不时地出现庸俗题材、语言、意象作“诗”的现象,尽管是个别现象,但也必须引起注意。我们应当运用好文学批评的武器,弘扬正气,扫除歪风。说到文学批评问题,有种种不良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些被批评者只听得进别人的赞歌,听不得别人说半句不是,而一些批评者只一味吹捧,不讲不足之处。这种风气不扭转过来,就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就失去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就严重影响到诗歌的健康发展。这些年来,我非常关注一年一度的中国诗歌综述的发表,但总让我年复一年地引起一番思考。既然是“综述”,而不是“专论”,为什么对占据中国诗坛“半壁江山”的古体诗词创作视而不见?为什么对有关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漠然不顾?为什么对开始兴起的创建中国新诗体的探索与实践置之不理?为什么对当前诗坛实际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样的“综述”恐怕至少是不全面的。诗歌的话语权不能只掌握在少数几个诗评家手里,我们一定要把诗歌的话语权还给广大诗人,还给广大读者,还给广大人民群众。诗歌的优劣要由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群众欢迎不欢迎,喜欢不喜欢,爱读不爱读,感动不感动,这才是判断诗歌写得与差的标尺。诗歌情系人民,人民心歌诗歌,扎根在人民心灵沃土上的诗歌才能枝繁叶茂,永不衰败。为此,我建议,要不断深化诗歌的繁荣,让凡想起作诗的,就自然想到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诗?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其质的规定性。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倡导诗的意境美、形式美、情感美、语言美、音韵美、哲理美,反对散文化、口水化、庸俗化、口号化,坚持正确的诗歌导向,让诗回归到诗的本质上来。

中国诗歌已经走过了三千余年的辉煌历程。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跨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坚信,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中国诗歌,一定会弘扬历史担当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一定会铸就中国诗歌的新辉煌!

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董作焉

诗人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先觉者,而诗歌是每个时代最敏感的风向标。诗歌作为诗人内心景观向语言投射的复杂产物,是生命个体观照所处时空产生的现实回声,天然地成为了折射时代意识的棱镜。它连接着某个时空坐标上个体的生命体验、集体的历史记忆和时代的意识背景,是我们体察时代、关怀现实的情感纽带,更可能是引领时代风气、引领思想流变的重要媒介。

新世纪以来社会的快速发展,为诗歌写作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和丰富的素材库,也为我们拓展语言空间的广度深度,充盈诗歌写作的思想关怀,写出更加能够映射时代、回应时代甚至引领时代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可能。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自觉提升和拓展诗歌本身的语言空间和审美要求的同时,完成诗歌对于当代经验的有效处理,使其具有穿透历史的时代锋芒和打动人心的现实力量?我想,要让直指现实、直击心灵的伟大作品成为可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体现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第一个问题是,新世纪诗歌为什么需要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之源。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是记录时代、抒写现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切近时代、观

照自身的情感纽带,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更因其澄澈优美之特性,承担着发现、记录和引领真善美的使命。古人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也是我们当代诗歌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伟大作品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特征,更是一部作品的实践场域和素材源泉。诗歌创作必然是作者内心景观的投射,这样的投射意味着由于个体生命体验沾染其中,不可避免地裹挟进了现实的参与。诗歌伟大之处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这为我们体察时代、观照现实,为我们发现和传播时代之精神、高尚之人格与生活之美好,创造了精巧而优美的语言容器。这些书写的对象,正是时代赋予诗人的资源和素材,更是一份必承其重的责任和使命。为了保证自己身份和书写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扣当代现实,才能既保证其成立,又保证其有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立场,我认为写诗就是自我的修炼,诗人应当培养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诗人抒写时代、体察时代,才能在当代时空中拓展语言空间的

充盈性,其作品也才会具有更加深切的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我们应该主动地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真正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而不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勾勒想象;真正用行动去体会风土民情,而不是沉浸于个人内心世界。其次,关于新世纪诗歌对于时代关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我认为诗人要对此保持某种“随意而警醒”的“凝视”。这段话的前半句来自张枣:“作为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混迹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后半句来自梁宗岱:“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这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时,既要深入时代和现代内部,去体察和摸索其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外,有距离地审视这个时代。只有这样包含着接纳与对抗、切近与疏离的审视,我们才既能保持审慎而清醒的认知,又能完成诗歌写作必要的美学与思想的高度,写出切入这个时代的诗篇。

当诗人们在他们的身份的自我确认中拥有了担当意识和责任感,当他们将其对于自我、国家和人民的关怀,以及这个时代的所有本真和伟大的精神自觉注入到其生命体验和现实经验之中时,一种更具活力、更富意义的写作状态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它就像精致的琥珀,曾见证了某个年代最精彩、最深刻的现实,历经了长久的磨砺和检验,因此光彩熠熠、璀璨夺目。

韩静霆大写意作品巡展举办

本报讯 11月24日至12月2日,由《艺术市场》《文化月刊》《艺术教育》联合主办、三品美术馆承办的“吼诗吟画——韩静霆大写意作品巡展(北京)”在京举行。开幕式上,陈铎、虹云、齐克建、邓小鸥、仲达文、宋克礼、雪村、肖爽等艺术家通过诗朗诵、古筝演奏、歌曲演唱等多种形式,展现了传统文人与当代语境中的转型。

作家韩静霆的书画作品多以诗配画,逸笔寥寥间体现人生百态。他在探求大写意绘画艺术新境的同时,重点关注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含量和文化品质,充分思考从图式、趣味到价值的变化。此次展出的60余幅画作为“笈马追梦”“荷塘寻梦”“诗痕吟梦”“花国记梦”四部分,可谓韩静霆近年来艺术实践探索的一次全新展示。(范得)

《中国当代玉雕艺术精品集》首发

本报讯 11月14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办,中国民协中国玉雕艺术委员会、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承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玉雕主题创作系列活动之《中国当代玉雕艺术精品集》新书首发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当代玉雕艺术精品集》收录了120余位玉雕艺术家的210件作品。这些作品虽题材广泛,风格和材料多样,但无不是艺术家们将爱国之情融入艺术事业、倾心时代、贴近生活、对玉雕艺术不断传承与创新的结晶,在践行与发扬工匠精神的过程中实现了力与美、精与巧、文与质的完美统一。(范得)

军旅新诗的本土意识与散发性思维

□曹凡华

我是个军中的歌者,以我之见,在当下诗歌艺术的创作氛围里,军旅诗人集群是最具创新可能和爆发力的一支劲旅,也可称之为别动队。因此,如何在军旅诗歌中注入丰富的文化信息、时代信息和现实信息,是我们军旅诗人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军旅诗有着悠远的文化渊源和丰厚的诗学传统。自《诗经》以降,在历史的天空里,优秀的军旅诗灿若星斗,夺人眼球。其中有许多星座,为浩瀚的诗之宇宙增添了光彩。千百年来,无数军旅诗名篇滋养培育着中国军人的文化品格,在当下新的时代,一大批军旅诗人继承优秀的军旅诗歌传统,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诗歌作品,在繁荣中国诗歌创作、满足军人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其中一员,我引以自豪也怀有内疚。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当了一辈子兵没打过几次像样的仗/写了一辈子诗没写出几句像样的诗”。这也算是对自己“才情”的一种哀叹吧。但我对中国新诗的前景仍看好,而且充满信心。中国新诗走过了百年历史,自胡适、徐志摩、郭沫若始,前赴后继的行者无数。如今,诗歌工作者更是成千上万,好诗层出不穷,已形成“高原”气候,“高峰”的出现也倚马可待。

自百年前新诗打破格律的约束脱颖而出,军旅新诗也一路走来,秉持着自身的本土意识,扎根于铁打的营盘,以流水般的接力方式,以攀爬楼梯的精神攻坚克难,把军旅新诗的创作一步步推向新的高度。本土意识的坚守就是一种传承,这种传承并非守旧,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瞻望世界,特别是对西方一些现代诗观念、技巧,采用一种散发性的思维,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在具象的连缀中叠加意象,使之更鲜活、更立体、更具诗的灵性。

这种本土意识与散发性思维的结合,造就了诸多军旅诗名篇佳作的诞生,一茬茬优秀的军旅诗人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百年新诗开拓者之一郭沫若就有过一段从军的经历,他自称“戎马书生”,其早期诗风的大气磅礴和阳刚之美,显然获益于中国的传统军旅诗歌。此后的艾青、臧克家的抗战诗,不仅承袭了中国军旅诗的传统,且吸收了外国诗的一些元素,令军旅新诗的形象更为葱茏和峭拔。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批踏着硝烟走上诗坛的军旅诗人如李瑛、公刘等,成为军旅新诗的领军者。他们的诗明显受古边塞诗的影响,但在为诗的技艺上,大胆地吸纳了西方现代诗的某些技法,使中国军旅新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在他们的影响下,周涛、叶文福、雷抒雁等创作的一大批军旅优秀诗作,为新时期军旅诗的振兴作出了贡献。当下的一些军旅诗人承前启后,在传统军旅诗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技法更为新锐,出现了不少可圈可点之作。他们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更大幅度地彰显自我,试图写出新一代军人的勇毅与血性。

在我看来,当下诗坛的热闹与沉寂,受文学创作碎片化时代诗歌的局限性影响颇大,军旅诗亦然。如何突破现实题材的外壳,化解生命表象的庸常,把眼光集中在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题材上,注意诗歌中潜意识层面的心理、下意识不可言表的元素,使之与时代合拍,与读者者的心理合拍,或许是关键所在。

阿根廷的战士诗人胡安·赫尔曼对诗人与诗有一个评价:“靠写诗你掌握不了权力/挣不到钱/得不到女人的爱恋/但诗人依然还在写……”这是为什么?是诗人的天性还是宿命,是诗人的责任心还是自驱力使然?我觉得,是诗歌这一文学形式的魅力和诗人特有的禀赋,使得他们为了诗而“九死其犹未悔”,军旅诗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统即根植于此。

英雄主义源自爱国主义,也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我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是《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那种爱国主义。我一直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部诗意表述的伟大宣言,并不是说将其分行即是诗,而是具备一种内在的诗性美。现在看来,只有从诗的角度,才能突破其时空局限,显示其真理的永恒性。所以说,诗人也要牢记自己的使命,不忘初衷。

诗歌高峰的攀登,需要对时代精神的精确把握。要有更深邃的思想理念、更娴熟的制作技艺、更持久的创造力和才情,而不仅仅是碎片式的、私密的个人抒情,须有宏大的诗意呈现才行。诗的经典性,只有在诗性的厚度与宽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所谓厚积薄发。融媒体时代为经典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会湮没一些好的诗作,机遇与挑战并存。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格言,真正的军旅好诗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习近平总书记任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有‘高原’缺‘高峰’”之说,切中了当前军旅诗歌的现状。我以为,“高原”与“高峰”的差距,是指诗的气象与格局上的差距,那些诗的高峰的攀登者与跋涉者如艾青、李瑛、雷抒雁等先贤已过世,寄望于年轻一代诗人们继续努力。诗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有可能被青年人“登顶”的,如雪莱、普希金、拜伦都是年轻轻轻便成为诗峰“登顶者”,也许,诗最需要情感的“爆发力”,而年轻人无疑会占有优势,这与厚积薄发并不矛盾。诗人的积累与小说、散文家的积累不太一样,更多地依赖于才情的喷发。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优秀诗人辈出、经典诗歌涌现的时代,诗人们当有这种自信。但自信不是自负,需要在刻苦创新的实践中相互砥砺而前行,只有这样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全国诗歌座谈会发言摘编

斯群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文联原副主席斯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1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4岁。斯群,原名王绪言,笔名粒紫,中共党员。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回忆无穷的少女时代》、评论《一幅典型的上海风俗画》等。

洪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部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洪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洪炉,笔名卢弘,中共党员。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我们十八岁》、传记文学《王稼祥一生》《李白钊传》《我的“祖国”我的“党”》等。

乔悟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源源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乔悟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乔悟义,笔名悟义,中共党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201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感悟》《我们脚下的路》等。曾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等。

(上接第1版)

2018年12月23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山花》有幸位列其中。作为文学内刊的创办者和写作者,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文学内刊是写作者温暖的启航之地。在文学内刊上发表作品,对于青年写作者起步阶段的鼓舞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记者: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请您谈谈《山花》的编者及作者群体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的坚守和实践。
曹谷溪:《山花》第一册合订本中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一朵小小的花儿红,生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其实“山花”就是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里面的“山丹丹花”。它生长在环境非常险恶的背阴山洼处,吸收得很少,奉献得很多,是陕北人民极为喜爱的一种野花。从《延安山花》到《山花》文学报的命名,就是想以此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山丹丹花”在贫瘠的陕北高原黄土地上生长,却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在黄土地上生活的文艺工作者,更应该植根于人民大众土壤,为人民、为读者奉献出绚丽的山花。作家不仅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且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山花》的出现,使得“延川山花”现象、“山花作家群”等诸多文学现象进入大家的视野。很多知名作家、评论家谈起这本刊物,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作为《山花》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我不敢说《山花》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意义,但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之际,我希望《山花》和当下诸多文学刊物一起,能够坚持人民立场,不忘“山花”初心,开创更广阔、更美好的未来。

湖北国际文学周举行

本报讯 11月25日至12月1日,“2019湖北(卓尔)国际文学周暨第五届武汉诗歌节”在武汉市等地举行。此次活动由卓尔公益基金会、卓尔书店、《中国诗歌》杂志联合主办。其间举办了“新发现”诗歌营、“诗漫江城”和“诗诵长江”诗歌朗诵会、龚古尔文学奖“中国评选颁奖”等活动。文学周以武汉为活动中心,蔓延到浠水县、赤壁羊楼洞古镇等地。

第十一届“闻一多诗歌奖”在文学周期间颁奖。诗人、散文家荣获奖。文学周邀请刘益善、李修文、方文山、颜艾琳和恩尼斯特·维茨纳、安娜·里斯托维奇等作家进行分享、对话,让文学真正走进人民大众之中。此外,卓尔书店每晚相继展映了《悲惨世界》《傲慢与偏见》《白鹿原》等中外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吸引了众多观众。

此次文学周还注重中外文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以“中国诗歌与世界”为主题的诗歌论坛上,诗人们谈到,当今世界诗坛的交融互通越来越密切,只有既传承本国文学传统,又不断开阔视野,睁眼看世界,吸收多种优秀文化,才能成为更好的诗人。在“中法文学沙龙”上,中外作家围绕中法文学的异同、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和前景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欣 闻)